



同文馆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造就道德

伦理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

[美] 托德·莱肯 著

陶秀璈 等译

张驰 校

Making Morality

Pragmatist Reconstruction in Ethical Theory

Todd Lek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造就道德

伦理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

[美] 托德·莱肯 著

陶秀璈 等译

张驰 校

Making Morality

Pragmatist Reconstruction in Ethical Theory

Todd Lek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43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造就道德——伦理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美)托德·莱肯著;陶秀璈等译;张驰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865-3

I. ①造… II. ①莱…②陶…③张… III. ①哲学思想-实用主义-研究 IV. ①B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5224号

Making Morality: Prmatist Reconstruction in Ethical Theory, by Todd Lek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and that the Licensee'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VUP.

Copyright©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2008.

书名:造就道德——伦理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

著作责任者:[美]托德·莱肯 著 陶秀璈等 译 张驰 校

责任编辑:王立刚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865-3/B·089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5217

印刷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2.75印张 200千字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献给维维安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再次对话

孙有中 彭国翔 安乐哲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介绍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介绍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

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①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②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③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④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并且,怀特海在事实上也显然没有深思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怀特海看来,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种他所认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学探险之外,那种经验主义自身也乏善可陈了。怀特海在将杜威和孔子联系起来的审视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辨识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难困境,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

①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 13.

②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 145.

④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 Y., Free Press, 1985, p. 7.

的这一困境常常使我们的哲学进路遭受挫折。^⑤

怀特海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唯理论的基督教神学,通过真理的形式化而驱逐了新奇妙趣。他接着突然转而攻击杜威和孔子,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逃避了终极问题的经验主义,而终极问题是经验中简单事实的基础。此处,怀特海将孔子和杜威明确地批评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者:即他们将兴趣局限在单调的事实上,从而遏制了这种大有潜力的情况:那就是所谓“愚蠢”和“多余”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思路。怀特海对孔子太苛刻了,在他看来,孔子导致了一个事物停止变化的时代,他责备孔子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僵化凝滞。^⑥ 不过即便在他轻蔑的评论中,怀特海仍旧认识到儒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向度,这至少有助于鼓舞我们通过揭示杜威和孔子的深刻来捍卫这两位思想家,以对抗怀特海本人的傲慢。

事实上,在怀特海所处的时代,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同行来说,在杜威与孔子之间进行比较的任何思路都令人迷惑。但是,从目前的高度而言,我将论证:我们能够界定一套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彼此相关的历史境况,多年之后,这种境况或许会得到权衡与考虑,并且,作为事后之见,或许还会被诠释为那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我们目前的世界是否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能够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珠联璧合呢?杜威的归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次不再遭遇五四运动的漩涡,杜威能成为一股助力去推动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吗?随着七十多个孔子研究机构在全美国的建立,对儒家哲学的精微理解最终会到达美利坚的海岸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是欧洲哲学,并且掌控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坐席和课程,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和巴黎如此,在北京、东京、汉城和德里也差相仿佛。如果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在海外受

^⑤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⑥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p. 176-177.

到忽略,那么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它们也同样被边缘化了。^⑦

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利坚,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旗麾之下,西方哲学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这场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所罗门(Robert Solomon)的话来说就是“超越的伪装”(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诸如观念论、客观主义、宏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和“所予的神秘”(the myth of the given)。当然,在杜威所说的“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批判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哲学的谬误”激发了杜威对观念论和实在论两方面的批判,杜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过程的结果反而被当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因。^⑧

过去的二三十年,尤其在美国国内(不仅仅在美国),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兴趣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对美国哲学演变的深入研究与

⑦ 诚如 Raymond Boisvert, *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一书中所论:在 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曾荣耀一时,但其影响在二战之前就烟消云散了。Harvey Townsend 在其 *Philosophica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中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美国哲学在美洲是一个受到忽略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出于对欧洲的敬重。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呼吁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歌唱自己的歌曲,他们的呼吁仍然被置若罔闻。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在随后两代人,这种偏见仍旧显而易见。在《剑桥西方哲学史》(1994)的前言中,当提到该书不同部分的作者时,主编 Anthony Kenny 指出:“所有作者都受过英美传统的训练或授教于英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作者都属于英美的哲学风格。”但是,在该书的主体中却并没有提到美洲的思想,没有爱德华兹(Edwards)、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也没有杜威。有关美洲所提到的东西,只有在索引中出现的“美国革命与柏克”、“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并且杰斐逊在正文中是作为“潘恩的朋友”出现的。显然结论是:美国哲学,即使是接近英美传统的思想家们,在塑造西方思想特征的过程中也作用甚微。委实,在美国,很少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能够使学生直接受到美国哲学的认真而持久的训练。就像日俄战争是在日俄两国之外的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一样,美国的大学当前也基本上是各种外国学术角力的战场。

⑧ 杜威早就看到,作为“哲学思维最为流行的谬误”,就是忽略经验的历史的、发展的和情境化的方面。正如他所见到的,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出在“从赋予个别因素以意义的有机整体中抽象出某一个因素,并将这一因素设定为绝对”,然后将这一个因素奉为“所有实在和知识的原因和根据”(John Dewey, *Early Works* 1:162)。有关历史、发展以及“哲学谬误”的脉络,参见 J. E. Tiles, *Dewey: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9-24。

日俱增,其中最好的就在这个译丛之中,这些凸显了杜威的贡献的专论把杜威的特点总结为: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当代学者们正在讲述一个重要的新故事,如今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杜威的中国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他,其实扩而言之,如今的美国学生何尝不如此。

直至晚近,专业的西方哲学仍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更不用说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了),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是怎么回事并不在意,这些哲学只不过是他们脑海中一些匆匆而过的印象。西方哲学乞灵于这样的理由:那些思想流派并非真正的“哲学”。如此一来,职业产生了“比较哲学”这样一个术语。这是一个奇怪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在哲学上得到论证,还不如说在地域上得到说明。

但是,在“经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脉络中,由一种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推行“国际化”的明智需要所驱动,非西方的各种哲学传统已经我行我素地对哲学系的课程构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入侵”。从熙攘的世界会议到檀香山比较哲学的小圈子,再到波士顿儒家,比较哲学运动已经肩负重任,并且在目前看似巨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中也创造了某些契机。对比较哲学运动来说,胜利仍旧遥远,但是,即使有朝一日当胜利到来时,那将会是一场仁慈宽大的凯旋之舞,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成功也就是将“比较哲学”这一别扭的范畴从哲学词典中废除而已。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边,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唐人街,而是正在经历着其悠久历史中最大和最彻底的变革。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清季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以来,中国人广吸博纳以求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在20世纪,马列主义经过几代人不断中国化,而刚刚开始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儒学则被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像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从欧洲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中寻找标准,将中国思想视为二流的概念(Chinese second order thinking)论证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传统。不过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而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

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

今天中国当代哲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从初期的康德、黑格尔,到现在的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兴趣转变对于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的开启关系重大,尤其是对于本土思维的现代相关性,就更为重要。^⑨ 中国主权在 20 世纪中期的重新确立,以及最近几十年,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稳步成长,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的、批判的意识,以此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和平台,来应对被耽搁的但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然而欧洲哲学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哲学,西方学术中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公允地忽略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很难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学到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力图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变和阐释的中国学者从关注被忽略的中国学者要贡献什么,扩展到了文化争论,并且对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也日益关注。西方汉学的翻译和讨论在中国获得了斐然的反响。

这种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条件环境已经为开启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之间的新对话搭起了舞台,儒家哲学随着中国人对其传统的自尊和自豪感的生长已经恢复了显赫的位置。这套丛书是我们以及中国学界同仁认为的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最好的著作,是我们推动这一对话的努力。

彭国翔 王立刚 译

(编按:孙有中教授审读了丛书中《杜威与美国民主》、《造就道德》、《理解杜威》、《阅读杜威》等译稿;彭国翔教授审读了《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杜威与道德想象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等译稿。)

^⑨ 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该书获得了出乎预料的欢迎。

致 谢

本书大多得益于休·拉弗雷特(Hugh Lafollette)具有洞察力的批评,他使这个早先底稿的版本成为富有思想,真实可信,内容详实的批判。迈克尔·艾尔德里奇(Michael Eldridge)提出了许多有用的评论,特别是最后一章。珍妮芙·威曼(Jennifer Welchman)对第一章提出尖锐的批评。虽然她可能不赞成最后的结果,我希望我已经对她的关注作出了某些公允的处理。在芝加哥的中西部实用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倾听了第一章的内容。我珍视与小组成员的多次讨论,其中包括查列纳(Charlene)和汉斯·塞格弗里德(Hans Seigfried),比尔·麦尔斯(Bill Myers),加里·海斯坦(Gary Herstein)和金·斯蒂克(Ken Stickers)。我把后来的作品在弗雷德里克·L. 威尔(Frederick L. Will)面前曝光,他当时在伊利诺伊大学进行毕业论文研究,他对我思考实用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我仅有少数机会来与威尔个人会面,但我实得益匪浅。詹姆斯·D. 华莱士的哲学著作,伊利诺伊大学的道德哲学讨论会,和明智而审慎的忠告使我获得了各种见解的批判的资源。理查德·L. 施卡西特(Richard Schacht),阿伦·汉思(Allen Hance)和贝特·柯格勒(Bert Koegler)在本书开始酝酿思想,动笔写作时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罗伯特·克劳特(Robert Kraut)对理查德·罗蒂的研讨,和本尼·罗生(Bernie Rosen)对实用主义的全面概述课程,在我于俄亥俄州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激发了我对实用主义的持久兴趣。我要感谢约翰·拉斯(John Lachs)和柯尼利·德·瓦尔(Cornelis De Waal)提出的批评意见,使本书趋于完满。我感谢校对编辑乔治·鲁皮(George Roupe)和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版社全体职员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出色工作。

我衷心感谢哲学文献中心,《国际哲学季刊》的发行人允许采用我文章“伦理学中的系谱学的规范效力”的某些部分,它最初刊登在第23卷,145号(1997年3月),第5章。

我的妻子,维维安·瓦格纳(Vivian Wagner)不断地要求我对我的哲学实践所表达的思想进行三思。对她的忠诚和共同的承受,——和对本书的题目——为此我很感激她。我的孩子,威廉和罗斯,在本书的写作之时是4岁和2岁,连续地教我共同学习,我感谢他们。

目 录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1

致 谢/7

导 言 作为矫正主义的实用主义元伦理学/1

道德理论化的根源/3

本书的计划/5

重构的矫正主义/7

与其他实用主义的关系/10

第一章 对实践知识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解释/13

实践知识的固定目的说:基本假设/14

意向性行为与辩护:固定目的观的论证/17

实践知识:习惯基础说/20

行知,新颖性,复杂性/21

习惯的合成/相互渗透/25

习惯及其应对/27

作为历史传承的习惯/29

实践理性和持续学习/31

价值的慎思:一个事例和一个模式/33

伪装的固定目的说? /41

通过实用主义更好地学习/44

持续的评价/45

实践辩护的固定目的说中的真理/50

动机:习惯基础说/51

目 录

作为冲动性精力系统的习惯/52
习惯和意志/54
作为推动力的习惯/56

第二章 行为中的善/59

引言/59
对善的功能性解释/60
内在的善和外在的善/66
非认知主义者和固定目的的幽灵/68
诸关系中的善/71
具体的善/73
冲突/79

第三章 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83

一个反对普遍主义和极端特殊主义的案例/85
反对极端特殊主义/92
丹西的极端特殊主义/93
约翰逊和图尔明的“新决疑法”/98
实践判断和理论知识之间的联系/103
道德原则的实用主义理论/105
常规的道德判断/106
权衡问题/107
道德论证的剖析/110
图尔明的实践论证的解释/112
道德盲目者的异议/115
解释的冲突：一个例子/117

目 录

第四章 道德界限和道德权威:实用主义观点/123

- 道德的领域/123
- 道德的定义:有关区别/125
- 道德规范的一些一般性质/129
- 道德规范的权威/133
- 杜威的职责理论/134
- 一般化的规范/137
- 道德相异/140

第五章 实用主义的社会批判/143

- 作为内在批评的社会批判/145
- 一种反对:我们需要“外在的标准吗”? /147
- 民主参与的认识论案例/150
- 杜威的公众理论/151
- 杜威的认识论论证/154
- 系谱学/158
- 系谱学和极端道德怀疑主义/162
- 系谱学探究和决断问题/165
- 慈善事业的案例/166
- 动物的案例/168
- 结 论/170

参考文献/173

索 引/179

译后记/185

导言 作为矫正主义的实用主义元伦理学

1

本书的目的是对道德的实用主义解释进行辩护。所谓“实用主义的”，我指的是一种对道德的解释，这种解释建立在美国哲学的古典实用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这种传统特别要归功于杜威所做出的贡献。^①在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我所发现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实践至上”(practice is primary)的主张。这种对实践的关注是彻底的——或许比人们所了解的还要更彻底。它并不仅仅是说哲学应该应用于实际问题，诸如怎样建立更好的学校，怎样使我们的经济制度更公正，或是怎样治疗临终的病人等问题。毫无疑问，实用主义者坚持认为哲学家们具有一种职业责任，这种责任促使他们介入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存在的问题中去，锻造出概念的工具以帮助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之所在。但是实用主义者的主张比起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这一方面还要更为根本。实用主义者所挑战的正是我们那种理论化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把理论化视为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②实用主义者不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理智的实践(intelligent practice)和不理智的实践之间做出选择。说哲学家应该关注理智的实践就是要拒绝任何把理论和实践彻底分裂的假设。实用主义致力于这种观念：有必要把理

① 本书中常会讲到“实用主义者”所相信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如何处理道德问题，实用主义者间存在某种普遍共识，很多实用主义者对于“什么才是实用主义道德中最重要的部分”持有不同看法。

② 在经典实用主义者中，杜威对这种对理论观念的彻底重建最为清楚。我认为在众多杜威理论的阐述者中，迈克尔·艾尔德里奇(Michael Eldridge)在阐述“理智实践”观念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很好地抓住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可参考其《转变的经验：约翰·杜威的文化工具主义》，范德比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Transforming Experience: John Dewey's Cultural Instrumentalism,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98)

性、人性、道德和形而上学等哲学观点解释为一种理论工具,这种理论工具是出于我们要使实践更加理智化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实用主义
2 是一种矫正主义哲学(revisionism)。实用主义批判哲学和常识,是由于它们倾向于掩盖我们对实在进行概念解释的暂时性和偶然性根源。我们对人类的有限性和偶然性的焦虑,致使我们设计出更高级的不变的实在,这就是上帝、形式、道德法则,或世界自身。我们不是运用我们的概念创造去应对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的现实(realities),而是设计出一个远离我们的完美存在的王国,让我们逃避不确定的现实。

为什么我们要设计出这样的理想王国呢?我们人类是富于理性和想象力的生物。理性思辨把我们从直接经验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制订计划,创造概念和理想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控制我们的世界。然而,人类理性经常会歪曲自己的活动。我们的想象力把我们的偶然性生活加以理想化,从而压抑了对我们偶然性本源的意识,我们编造关于来世救赎的故事或终极的永恒真理,从而歪曲了这样的事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的理智动物。^③

具体在道德问题上,对于“道德原理或准则反映了一个道德真理的不变实在”这个观念,我们可以提出类似的补充性解释。一种解释可以诉诸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的和宗教的权威以及统治集团的成员,借助于只有他们心知肚明的不可变更的、超越历史的真理而维持他们的权力。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识性的道德之所以诉诸超越历史的道德真理,是为了使这样的统治权力的作用得以合法化。例如,当代美国的宗教保守者们借助于不容变更的圣经真理来坚持异性婚姻结合的合法性,和同性恋婚姻结合在道德上的不正当性。对于婚姻道德的普遍理解建立在赞同异性结合的这种不变的性习俗上。道德原则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观念有助于维护那些从信奉这些原则中获益的人的特权。相

③ 对于这种理想化,杜威刚好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解释,可参考乔·安博伊斯顿(Jo Ann Boydston)编辑的《晚期著作,1925—1953》[以下简称为《晚期著作》(LW)]第四卷中《确定性的寻求》一文,以及本书第一卷中《经验与自然》一文。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Vol. 4 of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Feffer & Simons, 1981—1990. “Experience and Nature”, Vol. 1 of LW.)